

面向 21 世纪的课程现代化:背景、路向和行动

The Course Modernization Facing the 21st Century

黄甫全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 广州 510631)

一、历史背景:课程范式的周期性突变

课程现代化的实质是什么?课程是历史的产物,课程的实质寓于课程的历史逻辑之中。课程的历史逻辑,可以概括为“课程范式的周期性突变律”。

1. 历史上已有的 4 种课程范式 课程实质上是知识的一种特殊形态,因而,在库恩(Kuhn, T. S.)的科学革命观看来,学校课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改革和变迁,实质就是课程范式的变迁。所谓的课程范式是指,特定时代里相互适切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的教育内容及其规范化结构程序、课程成就和课程观念的集合体。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产生和存在着 4 类常规课程,寓于其中的是 4 种课程范式。第一是“原始”课程范式。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课程范式,时间大致是从公元前 4500 年到公元前 600 年,具有特殊的源流和起始意义。“原始”课程范式以古代苏美尔人的“文士学校”的课程为典型代表。第二是“艺术”课程范式。这种范式从古希腊雅典时代一直持续到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时间大致从公元前 6 世纪跨越到公元 14 世纪。它萌生于古希腊雅典,而成型于欧洲中世纪的学校。那时,一方面课程首次担负起了甄别和筛选知识的职能;另一方面形成了以“7 种自由艺术”为核心的比较完美的课程结构。第三是“学科”课程范式。它从 15 世纪发轫,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至今仍在产生作用。那时人们创造出了教材,建构起了以“分科”为形式的学科课程模式。第四是“经验”课程范式。它萌动于 19 世纪末,在 20 世纪初脱胎而出,成为欧美学校常规课程的“精灵”,一直持续到 50、60 年代。“经验”课程范式虽然饱含对儿童感伤的自然主义情怀,但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唯理性主义无止境泛滥到极点的当代,已经不起新兴的结构主义、人本主义的追问而面临危机。

2. 周期性突变律的基本涵义 在一定时期内,课程总是以一定的形式不断地吸收文化发展成果

从而构成新的课程内容,经历着的是一种累积式的量的变化,并呈现为该时期的常规课程,其中寄寓着一种特定的课程范式;而随着社会文化的每一次大发展,已有课程范式不能适应,导致常规课程出现危机,引发一次课程革命,发生质的变化,课程内容、课程形式和课程理念产生一次新旧交替,新的常规课程形成,并寄寓着以改革的成果为核心构造出的新的课程范式。

迄今为止,已经进行的课程改革有 4 次:第一次是在古希腊雅典时代,第二次是在文艺复兴当中,第三次是在 19、20 世纪相互交替之际,第四次则始于本世纪 50 年代;而课程范式的突变如前所述,迄今已经历了四大周期。不同课程范式持续的时间即课程范式突变的时间间距,是依次递减的并遵循指数函数律,即各周期持续的时间是周期序数的指数函数。如果设 f_n 为课程范式第 n 周期的持续时间,那么就有指数函数:

$$f_n = f_{n-1} \times 2^{1-n} (f_0 = 4\ 000, 0 < n \leq 4; \text{单位为年})$$

在上式中, $f_0 = 4\ 000$ 年,是来自“原始”课程范式持续的时间,直接的含义为:不同课程范式持续的时间是以“原始”课程范式的持续时间为基础的;其深刻的涵义则为:课程范式的突变律是由课程范式产生时被赋予的本性所规定的了。这里之所以限定 $0 < n \leq 4$, 一是因为经验上起始周期即为第一周期,它的序数大于 0;二则一旦 n 大于 4, 比如 $n=5$ 时,代入上述公式,得 $f_5 \approx 4$ (年),即第五周期的时间为 4 年左右,结果就与经验事实相悖。一种常规课程及其课程范式至少要覆盖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 12 年,必然大于 4 年。这表明,上述指数函数律只切合于迄今为止的课程变迁史,超过这一范围它就失效。它启示我们:当代课程改革是课程变迁史上产生“质的飞跃”的断裂期,意即迄今为止历史上出现的 4 个周期,已经完成了课程范式演变的一个大周期;而从 50 年代以来的当代课程改革开始的是课程范式演变的另一个新的大周期。

已有的 4 种课程范式都把儿童和教育内容看成是对立的,要么出发和落实于作为客体的内容上,要么出发和落实于作为主体的儿童上,使课程

中出现了“主客二分”。它们实质上均属于“主客二分”型课程范式。而当代“课程改革”从一开始便立意超越“主客二分”，走向“主客统一”。首先，布鲁纳(Bruner, J.)从认知层面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学科结构”，阐明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作为客体的“学科结构”与作为主体的“认知结构”在课程里的整合。人本主义者又在认知的基础上补入了“情意”，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出发，强调课程既要实现儿童的“认知”与“情意”的整合，还要实现儿童的认知发展和情意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整合。这样的课程范式显然与已有的“主客二分”型课程范式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崭新的“整合”型课程范式。沿着课程自身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历史脉搏的律动，我们感悟到，当今课程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课程范式从“主客二分”向“整合”的转型。

二、现实路向：构建“整合”课程

应该建构什么样的“整合”课程？循着课程演变的历史逻辑，针对现有“学科”课程的根本缺陷，我们必须超越“学科”课程，构建新的“整合”课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培育和实现以下新的理念。

1. 树立为世界的教育和课程发展作出贡献的远大抱负 10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课程一直在模仿、借用外国的理论和模式，思想意识中存在着盲目模仿的追随的心理。只有走出这种一味模仿、追随心理的限定，树立民族自信心、自强观念和创新追求，才能树立为世界的教育和课程发展作出贡献的远大抱负。我国将在21世纪中期建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强国”意即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均居前列地位，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要与这种“强国”地位相称，我们的教育和课程就必须创新，建立起教育强国。

2. 确立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远大教育理想和培养公民的共同教育理想 我国当代社会理想分为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那时需要“全面发展的人”；而共同理想是在21世纪中期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时则需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因此，我们应当确立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远大教育理想和培养公民的共同教育理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条件下人发展的普遍规律。长期来我们都打着这面旗帜，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则“唯政治需要是从”。比如，50年代后期大搞“劳动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则办“革命教育”；而到了80年代，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的任务，就搞起了“素质教

育”。我们必须超越这种“社会政治本位”的教育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远大教育理想，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化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培养公民”，是面向21世纪中期实现现代化的客观社会需要。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而现代人的个人特质和社会角色的统一“点”是“公民”。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实质上是人从“臣民”、“私民”新生为“公民”的过程。而“公民”新生的机制，无疑是教育。因此，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背景里，我们应当提倡和实施“公民教育”，培育并去实现“培养公民”的共同教育理想。

3. 树立“整合”的教育、课程价值观念和“三基一个性”的整合中心 课程是文化的缩影，我国的课程必然和必须是包涵我国文化的当代文化的缩影。现在寓于学校课程中的科学文化价值观念，实质上是后现代主义的工具理性还原理念的体现，必须更新为“整合”的教育、课程价值观念。整合价值观念涵括工具学科、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合，身心发展的整合，认知、情意与道德的整合，以及文化发展与儿童发展的整合。

从5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指导课程和教材实践的课程理论——“双基论”。几十年中，我国中小学课程改进是围绕着实现“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展开的，实质上就是以“双基”作为课程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界对“双基理论”进行了扬弃，补入了“基本能力和个性健康发展”，形成了“三基一个性”的新的理念结构。笔者认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幼儿园的整合课程中，应当把“三基一个性”作为整合的中心。

4. 走向“整合”课程 整合课程实质是一种采用各种有机整合的形式，使学校教学系统中分化了的各要素及其各成分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的课程形态。“整合”课程是针对“学科”课程割裂知识的弊端而在19世纪开始萌动的，100多年来，人们创建了不少的整合课程的类型，其中主要有相关课程、广域课程、融合课程、科际课程和活动课程等。

整合课程作为人们创造的一种课程新形态，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汲取了几代教育家有关的课程新观念、新观点和新主张，孕育了一种新的课程理念。在这种新的课程理念中，价值整合观念是核心，5个层面的整合是主要内涵。第一个层面是相邻知识系列的整合。这是最直观、最基础、最容易实现的整合，比如代数、几何、三角等知识系列的整合，植物、动物、生理卫生、生态环境等知识系列的整合。第二个层面是性质相近学科的整合。这是基于相邻知识系列有机联系起来的、比较容易实现的整合，比如物理、化学、生物整合形成的“整合理科”，历史、地理、道德等整合形成的“社会科”，音乐、美术、舞蹈等整合形成的“艺术科”。第三个层面

是人文、自然和社会学科的综合。这是当代为解决环境污染、核威胁、“精神家园”丢失等社会问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整合层面。比如,为了理顺和帮助人类正确理解人、社会、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价值与非价值、正功能与负功能、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共存的复杂关系的“STS 课程”。第四个层面是文化的整合。长期来形成和流行的学科课程,对文化发展在具有选择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封闭性,使得学校里的教育内容与文化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割裂。整合课程有鉴于此,便着力构建课程的开放与选择相统一的机制,从而保证新知识能及时进入课程与已有知识形成有机整体,实现教育内容变化与文化发展之间的整合。第五个层面是儿童与文化的整合。现代工业化导致的是文化对人的异化,这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就是教育内容对儿童需要的漠视、疏离和束缚,教育内容的割裂带来的儿童发展的片面化,从而形成了学校教育内容与儿童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对立。整合课程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儿童与文化的整合,让教育内容成为儿童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优化的环境、土壤和养料。

三、未来行动:建立新课程、新教育模式

我们应该怎样来建构新型课程?这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并分析我国课程现代化的当代起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为迎接 21 世纪的现代化新浪潮,许多国家和地区均采取了强有力的深化课程改革的举措。这些举措具有革命性,正孕育着课程范式第四个突变期的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组织实施的《2061 计划》,它以根本解决当代教育内容机械膨胀问题为主要目标,以普及科学、提高美国的国力为宗旨,最终将建立和实施一种与现在根本不同的课程模式。该计划分为 3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科学文化观念为依据,重新选择课程内容;第二阶段是将新选出的内容转化为几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课程模式,并制定出教育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蓝图;第三阶段是全国有关机构和团体通力合作,将第二阶段绘制的蓝图付诸教育实践。这个计划起始于 1985 年,时值哈雷彗星光临地球上空,而到 2061 年它将再次光临。《2061 计划》的名称即取自于此。它饱含着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期望,期待到 2061 年哈雷彗星再次露面时,能看到它的一代新人是经历了新的课程蓝图熏陶而能幸福生活的人。

《2061 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完全脱离开已有课程、教材的“巢臼”,重新从文化中选择出新的课程内容。其选择标准是:到 21 世纪中期,所有经历了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的学生为能幸福生活而

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和处事态度。为此,组织了全世界数百名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教育家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研究报告于 1989 年出版,题名《普及科学—美国 2061 计划》。在这份文献中,依据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势和要求,先从横向上划分出新的“生物科学和保健科学”、“数学”、“自然科学、信息科学和工程学”、“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技术”等 5 大类,以此为框架,分别选择出内容。然后,将这些“分类”的内容进行再次的水平维度的整合,分为有机排列的“科学的性质”、“数学的性质”、“技术的性质”、“自然环境”、“生存环境”、“人类机体”、“人类社会”、“被改造了的世界”、“数学世界”、“历史观点”、“通用概念”和“思维习惯”12 部分,构成了在中小学、幼儿园里应当学习、掌握、形成的知识、技能和处事态度的新内容和新框架。

国外的经验驱使我们不能不去认真地审视当前我国的课程改革现状,慎重而深入地思考和选择未来的行动。

新中国诞生后,中小学课程先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后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冲击,课程建设走过一段弯路。70 年代末开始进行课程改革,至今课程、教材已走出“一纲一本”的僵化模式,实现了“一纲多本”,正在向“多纲多本”过渡。不过,这一改革的矛头直指的仅是课程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弊端,其实质仅是革新课程管理体制。尽管它也触及课程内容和形式,并使之产生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只是累积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中小学课程内容机械膨胀、课程超载、学生负担过重等严重问题。

当今我国中小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课程内容机械膨胀、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基础教育的基础空前地提高了,而儿童个体的发展潜能却仍有相当大部分尚未发挥;由于当今计划生育的延续效应和人们生育观念的嬗变,21 世纪中下叶,我国年轻一代将面对 1 比 3 的生活养育重担与个体尽可能自由发展的尖锐矛盾,基础教育必须培养他们具有解决这一矛盾的勇气和能力;面对未来的挑战,我国中小学幼儿教育尚未获得应有的运行机制和动力,尚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徘徊。

在 20、21 世纪相互交替之际,眼观国外课程变迁中第四个突变期萌动的浪潮,我们特向国家有关部门和组织发出建议和呼吁: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去组织、实施和完成从现在起到 2049 年的一项系统的大规模工程,使基础教育及其课程发生适应未来需要的彻底变革。建立起适应 21 世纪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需要的基础教育和课程的新模式和新运行机制,使中小学幼儿园获得主动走向未来的动力和活力。它的主要目标为:将教育方针和教育目

(下转第 29 页)

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一些新兴部门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机会。私营企业尤其是高技术跨国公司的一些机构正在敞开大门,给大学毕业生提供新就业机会。现在每年离开印度的科技人员已不到1 000人。

参考文献

- [1]方圆,世界各国科学经费投入的比重,当代世界,1995.9,P45
- [2]各国概况—亚洲部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8月,第3版,P370
- [3]全国高等教育情报网等编,国外高等教育快讯,1994年5月,第4期,P7

(上接第8页)

发展。发展科学、造福人类是科学家神圣的职责,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自然通过自然选择“培育”了今天地球上的各种相互适应的生物多样性群体。千百年来,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采用各种遗传育种技术,通过人工诱变和选择的方法,以比自然进化过程快几万倍的速度,培育了许多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现在利用遗传工程技术可以数十亿倍地加速这个自然的进程,并有可能产生出跨越种间屏障的新物种。它们有更高的产量、更好的质量,更耐寒抗病,而通过克隆技术则可以使这种优良品性保持不变,并进行大量复制。在这里,科学家好似正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我们没有理由为想象中的“恐怖乌托邦”而放弃这种机会。因为这是科学所赋予的权力,是造福于人类的事业。

我国在人和动物人工受精的研究以及用胚胎干细胞核移植技术生产具有相同遗传背景的动物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在这里顺便提及一个有关概念的问题。自从克隆羊多莉报道以来,媒体不时地报道有些国家早些年就已经成功地“克隆”出了鼠、牛,甚至猴的消息,其实这些所谓的“克隆”鼠、牛、猴与多莉有着本质的区别。多莉产生过程中,移植的是高度分化的体细胞的核,而上述“克隆动物”产生过程中,移植的是尚未分化的、由有性生殖过程生产的受精卵分裂而成的裂球的细胞核。这一差别在理论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技术上则有很大的难度上的区别。此外,它们发育生成的个体具有两性亲本的共同特性,没有与其遗传背景完全相同的亲体,所以与无性繁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国目前在哺乳动物体细胞核移植克隆动物方面尚属空白。加强动物克隆技术的研究是我国生物高技术研究中一个亟待加强的重要方面,这不但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务必排除一切可能的舆论干扰,大大加强投资力度,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目标予以实施,使我国在此领域尽快进入世界先进水平。

(责任编辑 肖庆山)

- [4]莘国梁等译,人才外流及其逆转,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P5
- [5]华碧云编译,印度科技人员的外流与回归,教改学习资料,1988年2月,P126
- [6]国辉,世界科技经费投入概况,科技日报,1992年8月26日
- [7]杨京京,印度政府对科技资源的使用,科学学研究,1996.2,P68
- [8]仙洛宇,印度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国际化,全球科技经济瞭望,1995.2,P40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上接第32页)

的具体化,制定出中小幼儿园各级学校具有弹性和发展性的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重新从人类文化中精选出自幼儿园至高中教育的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构成新课程内容;根据课程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研制出可供选择使用的课程模式和配套教材;构建起具有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活力的中小幼儿园新教育模式。

具体实施可分四步走:第一步,在2005年以前,组织300~500国内外杰出的各个学科的科学家的,建立起基础教育整体性和发展性改革的基本信念,按“少而精”和“举一反三”的原则,从人类文化宝库中甄别和挑选出自幼儿园至高中教育的学生必须而且能够掌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公理、基本技能、基本能力、基本人生观念和普遍性主题,构成中小学和幼儿园新的课程内容。第二步,2006~2010年,组织1 000名教育学、心理学及各科教育的知名学者和中小幼儿园的优秀教师,根据适应和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原则,将重新挑选出来的中小幼儿园的课程内容转换为3~5套可供选择使用的新课程模式及其实验方案。第三步,2011~2025年,在各省、市、区选3~5个有代表性的市县,将第二步设计出的课程模式和教育模式投入实验,进行验证、修改和完善,确立起新课程模式和新教育模式;同时为师资培养、教育设施建设、入学注册制度、考试制度、升学制度和就业制度等改革设计出备选方案。第四步,2026~2049年,在全国范围内把第三步确定的蓝图付诸教育实践,建立起新课程模式和新教育模式的运行机制。最终建成“整合”课程,完成课程范式从“主客二分”向“整合”的历史性转型。

抓住当今课程范式的突变机遇,采取全国性重大行动,建立起新课程模式和新教育模式,这是我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的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当代课程改革和教育改革应当承担起来的一项历史性课题。这是历史的呼唤,也是未来的呼唤!

(责任编辑 肖庆山)